

# 《世界经济年鉴 2016》

## 2015 年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综述

欧阳向英<sup>①</sup>

本文选取 2015 年度发表在中文期刊《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管理世界》《世界经济与政治》《马克思主义研究》《国际经济评论》《欧洲研究》《国际金融研究》《国外理论动态》和《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以及英文期刊《新政治经济学》(New Political Economy)、《科学与社会》(Science & Society)、《社会主义者登记簿》(Socialist Register) 和《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上的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论文 59 篇，从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基础理论、世界资本主义多样性、金融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危机、中特理论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世界社会主义与国际共运理论等五个方面对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理论动态加以研究。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多样性和社会主义发展过程的曲折性构成张力，反映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鲜明的实践导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世界经济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也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指明了发展方向。

### 一、前言

国际金融危机后，资本主义国家对生产关系和政治制度多样性的反思预示着世界体系的脆弱与变革。全球化背景下，中特理论对世界经济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哪些影响，社会主义是否最终解决方案，东西方学者积极探讨并各自给予了回答。2015 年，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围绕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基础理论、世界资本主义多样性、金融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危机、中特理论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世界社会主义与国际共运理论等五个方面展开，国际问题与国内问题交织在一起，研究视角不断丰富与扩大。在此对 2015 年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进行综述，为保持客观性尽量摘取原文，其中有些观点可能需要做进一步的分析。

本文选取 2015 年度发表在中文期刊《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管理世界》《世界经济与政治》《马克思主义研究》《国际经济评论》《欧洲研究》《国际金融研究》《国外理论动态》和《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英文期刊《新政治经济学》(New Political Economy)、《科学与社会》(Science & Society)、《社会主义者登记簿》(Socialist Register) 和《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上的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论文 59 篇，以及专著 7 部，从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基础理论、世界资本主义多样性、金融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危机、中特理论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世界社会主义与国际共运理论等五个方面对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理论动态加以研究。需要指出的是，2015 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成果颇丰，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重印和解读、资本主义批判和未来社会构想，有多部著作和许多论文，预示着世界思潮的悄然变化。只是，我们选取的专著和论文

---

<sup>①</sup>欧阳向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oxyymail@126.com。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人的建设性意见，并自负文责。

侧重国际研究，虽比照 2014 年，2015 年论文的选取适当放宽了标准，主要考虑的是国际问题研究应以国内问题研究为基础，很多问题的出现与解决都需考虑双重因素，过于严格筛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论文可能会漏失政治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基础，但是这个范围不宜过度放大。世界经济与国际政治和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交集才是我们聚焦的核心领域。同时，本文适当收录了有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些论文，只不过侧重点仍是理论研究而非实践进展，因为相对于本学科来说，理论研究始终是我们关注的重点。需要说明的是，文中涉及的西方学者大部分并非传统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但其关注的问题、运用的方法、分析的框架和得出的结论与马克思主义或有思想渊源，或形成对比参照，总体可称国外左翼。为了将国外前沿动态纳入到本学科的研究视野，我们尽可能将他们的相关文章收录在内。受选取的期刊范围等客观限制，挂一漏万在所难免。

表 1 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专著出版统计（按国别）

国别	出版社	品种
中国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
美国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
英国	Pluto Press	1
	Verso Books	2
	Routledge	2

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多样性和社会主义发展过程的曲折性构成张力，反映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鲜明的实践导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世界经济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也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指明了发展方向。

表 2 2015 年度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期刊文献分布

类别	中国社会科学	经济研究	管理世界	世界经济与政治	马克思主义研究	国际经济评论	欧洲研究	国际金融研究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国外理论动态	新政治经济学	科学与社会	社会主义者登记簿	美国经济评论	合计
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基础理论				1	4					1					6
世界资本主义多样性							1		1	8	2		2		14
金融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危机					9				1	4				1	15
中特理论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1	2	1		6	2		1							13
世界社会主义与国际共运理论					4				3	1		2	1		11
合计	1	2	1	1	23	2	1	1	5	14	2	2	3	1	59

2015 年，《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国外理论动态》仍是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论文发表的大户，分别为 23 篇和 14 篇，合起来占总数的 63%。次级梯队为《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发表 5 篇，其他期刊发表数量在 1-3 篇之间。《中国社会科学》是非常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阵地，但 2015 年就国际政治经济学发表的文章不多，从侧面反映出该领域的研究仍需加强。国外左翼期刊仍存在现象描述多而学理分析少的问题，很多文章达不到选取的标准，故舍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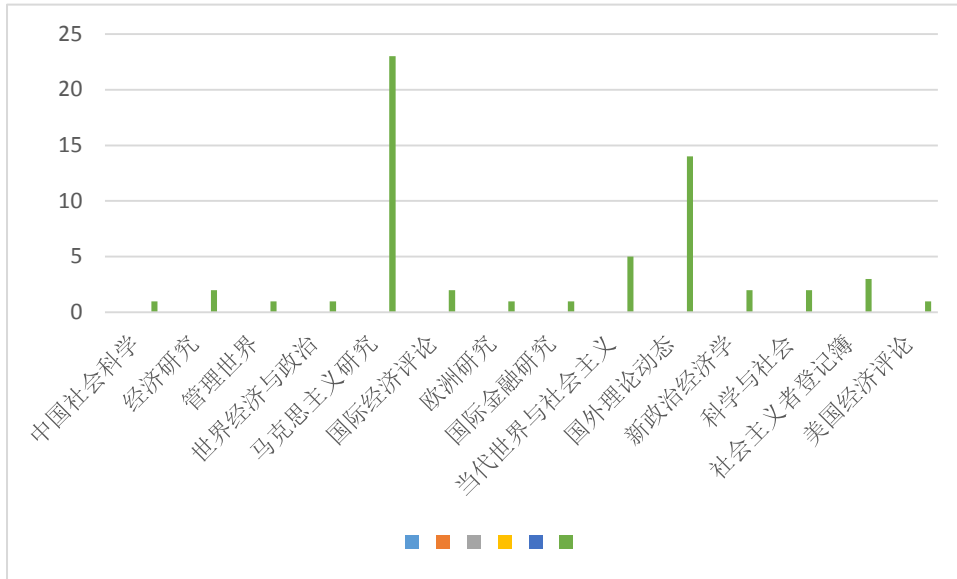


图 1 2015 年主要期刊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发表情况

从话题重要性来看，世界资本主义多样性和资本主义危机得到了相当大的关注，实际这两个问题是联系在一起。某种程度上讲，强调资本主义多样性是危机的一个解决方案，表达了处于资本主义不同发展阶段的各国自主探索本国道路的呼声。中特理论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也得到了广泛关注。这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处于多个问题的交汇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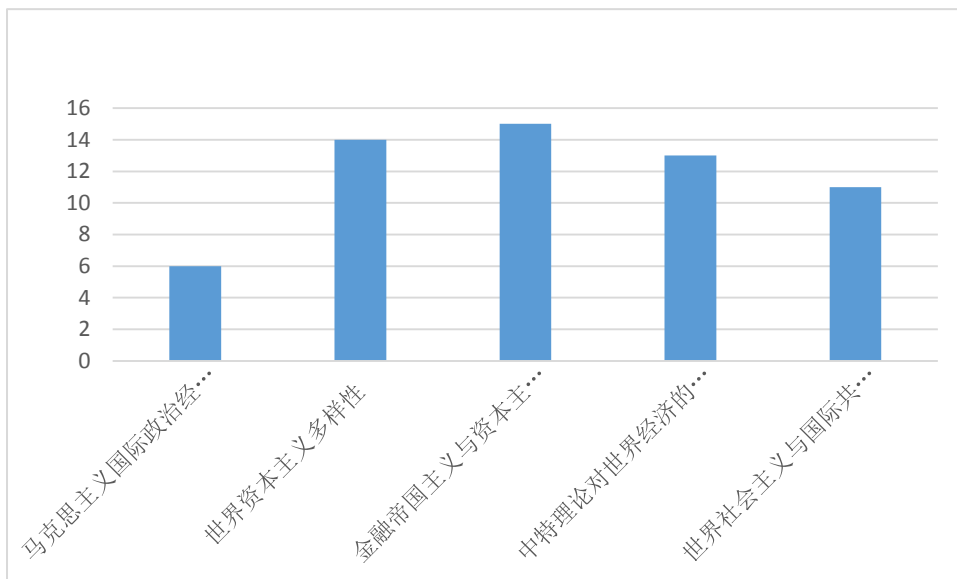


图 2 2015 年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话题分布

## 二、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

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既从属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又从属于国际政治经济学，尚不是一个成熟的学科，在西方学界也不占主导地位。时代赋予我们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使命，包括构建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的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必须有清晰的基本范畴和逻辑关系，才能形成有别于其他学科的理论框架和分析

视角。国际劳动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概念，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外扩张造成的、超越国家界限而形成的国际分工是国际贸易的基础，反过来国际贸易的发展又深化了国际分工。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相互推动，使资本主义国际生产方式得以确立。没有国际劳动和国际分工，就不会有国际生产关系，也谈不到国际交换和分配关系，更不会有以研究国际经济关系为基础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在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条件下，产生了国际价值，导致世界货币流动，形成了各国货币的汇率。国际信用体系在推动国际贸易发展的同时，又会引发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经济危机到一定程度必然发展为总的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而战争是解决危机、转移危机的途径之一。周期性爆发的资本主义世界全面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克服危机的根本出路在于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制度的建立。也就是说，国际劳动和国际分工是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起点，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世界市场、国际价值、世界货币、国际贸易、世界经济危机是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而世界战争和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是最终结论。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范畴和逻辑线索。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应研究国际贸易中的不平等性和两极分化，研究国际金融领域的投机性和掠夺性，以及资本主义世界总危机。运用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有助于对世界宏观运行、整体结构、内部关联和发展趋势给予科学而全面的回答，从而更好地为“中国梦”的实现服务。<sup>①</sup>

李滨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是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来研究国际层面的政治与经济互动关系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学派。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逻辑是，以世界范围内具体历史阶段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研究的出发点，探讨各个历史阶段国际生产的不同特征，分析其对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带来的影响。也正由于是一定历史阶段的生产，我们必须充分注意当时既存的政治环境与政治因素对国际生产过程的反作用。这种在国际层面对政治与经济互动关系的分析关键在于结合具体的生产方式及其所处的政治环境。作者结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政治经济学著作来具体展示这一研究逻辑在各个经济分支领域如生产、交换、金融与分配领域的应用，在此基础上结合当代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一些研究来演示这一逻辑在当今国际政治经济学各主要分支领域如跨国生产、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和发展中的应用。<sup>②</sup>

经典著作研究是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今世界，虽然全球生产分工形式、生产垄断组织的形式发生变化，帝国主义的权力机制和统治形式也发生一定的变化，但帝国主义时代的大背景没有变。周淼指出，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了处于一般垄断阶段的资本主义，把生产、垄断问题作为帝国主义研究的理论基石和逻辑起点，并以此对时代问题、社会主义运动问题展开讨论。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深入分析当今时代问题以及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对这些问题作科学分析，有助于我们客观清醒地观察世界，制定正确的国际战略和对内对外政策。<sup>③</sup>有学者对希法亭的垄断模型的基本参数及其政治应用进行回顾，努力描绘了其在现代文献中复活的历史相似性。有人认为，源自列宁“帝国主义论”的希法亭模型基本上与马克思的经济学无关，却在很大程度上与垄断和寡头垄断的新古典主义理论有关。这种理论上的联系在分析框架上抛弃了劳动价值理论，认为任何资本主义积累过程都存在着崩溃（萧条）的可能性。在希法亭看来，部门间的不均衡增长是经济危机的原因，在金融资本统治的条件下，这一矛盾将得到解决，资本主义将走向有组织的阶段。以同样的方式，金融部门及其相关的公司经济部门之间的不均衡增长被当代的异

<sup>①</sup>欧阳向英、刘国平、李燕（2015）《马克思主义世界政治经济基础理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年版。

<sup>②</sup>李滨（2015）：“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逻辑”，《世界经济与政治》，第7期，第4-23页。

<sup>③</sup>周淼（2015）：“生产、垄断、帝国主义的变迁与当今时代”，《马克思主义研究》，第8期，第81-89页。

端文献认为是当前危机的原因。以这种思路,通过国家调节就可以解决危机问题,因为资本的金融化被孤立地理解为利润驱动增长的内在矛盾。<sup>①</sup>

“资本内在否定性”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核心表达,也是《资本论》的方法论——它是资本主义体系的动力学,是研究以“资本—劳动”为轴心的社会生成的分析框架。该框架表明:跨国资本和跨国生产重塑了资本主义的劳资关系,形成了跨国阶级,改造了民族国家,建立起跨国国家机器,带来了社会动员、政治认同的广泛变化和更为深重的社会不平等;当前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本质上是跨国资本扩张的内在要求,是资本精英组建新的积累结构的尝试,真正的全球治理必须从改造资本—劳动关系、重建大众阶层社会权力出发,否则就只是又一次的社会反向运动。<sup>②</sup>渡边雅男、谭晓军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在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探讨全球化的形成,以当代反全球化运动中产生的理论分析全球化的本质。他们认为,全球化的本质与两个原理密切相关:一个是以阶级社会为媒介形成的资本主义的体制原理,另一个是以国家之间的权力平衡机制为媒介发展起来的帝国主义的国际原理,并指出当今全球化的实质就是美国帝国主义的霸权。相对于引发不平等的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世界将会对抗性地产生出谋求平等的另一种全球化,这是历史的必然,社会科学研究者肩负亟待解决诸多全球化课题的重任。<sup>③</sup>全球化在突破时空障碍、促使资源流动的同时,也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更广阔的空间中自我溢出、重新布局的过程,阶级关系从国家层面逐渐转变到国际层面,整个世界日益分裂成跨国资本家阶级与全球无产阶级。阶级斗争远未在这个时代中消失,它只是在更为宏观的场域中,在更为普遍的生产方式的自我掩盖下,以更为隐匿、更为复杂的方式进行而已。在中国日益融入世界历史的今天,任何对阶级斗争漠不关心的思想和观念不仅是错误的,更是危险的,这使得如何以全球化的视野重新审视阶级斗争成为现时代的重大问题。<sup>④</sup>

### 三、世界资本主义多样性

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建立在对当代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发展模式的研究和效果评估上,有助于深入理解资本主义灭亡的必然性和曲折性。在此之前,曾长期存在某种资本主义阶段论,该理论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受到进化论、马克思主义社会阶段论和人类学阶段论的影响。据此,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生产方式,经历了商业、工业和金融等三个进化阶段。埃玉普·欧兹维伦等人对进化论和多样性两种理论进行研究,认为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通过给效率加上很高的权重,倾向于将所讨论的类型排序,而这种排序在某些情况下会暗含低效率类型将朝着高效率类型发展之意。这就意味着,构成某种资本主义类型的若干要素实际上有可能与某个特定进化过程中的若干相继阶段相匹配。<sup>⑤</sup>也有学者提出不同于多样性理论的分析方法,认为资本主义之所以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具有生命力,在于它可以通过主体驱动的渐进式变革解决制度性瓶颈问题。米歇尔·马斯特罗尼就构建了一种探讨主体对制度体系的影响以及行为的政治或社会动机的分析方法,该方法偏离了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所描述的那些国家类型,而是区分了决定性制度和工具性制度,分析了各个制度层面所特有的变革在难易程度与速度

---

<sup>①</sup>尼克斯·斯特拉夫拉克斯、盛国荣(2015):“希法亭与马克思”,《国外理论动态》,第3期,第65-81页。

<sup>②</sup>沈斐(2015):“资本内在否定性框架中的跨国资本和全球治理”,《马克思主义研究》,第11期,第75-83页。

<sup>③</sup>渡边雅男、谭晓军(2015):“在历史发展和现实运动中把握全球化的本质”,《马克思主义研究》,第11期,第101-109页。

<sup>④</sup>刘宇(2015):“论全球化时代的阶级斗争问题”,《马克思主义研究》,第11期,第110-117页。

<sup>⑤</sup>埃玉普·欧兹维伦、乌特库·哈乌斯、艾穆拉赫·卡劳祖兹、尹昕、曹浩瀚(2015):“从资本主义阶段到资本主义多样性:教训、局限和前景”,《国外理论动态》,第11期,第2-18页。

方面的差异,以及各制度层面的变革如何共同影响制度体系的演变。通过这种方式区分不同的制度,为解释行为主体和制度之间的互动及其可能带来的变革提供一种更为灵活的方法。<sup>①</sup>

欧洲是资本主义多样性表现最为充分的地区。近年来,欧洲学者对资本主义多样性的研究日益深入,并将矛头指向欧盟,在一定程度上撼动了欧盟大一统的基础,蕴含着欧洲变革的呼声。有学者指出,以往欧盟过分强调统一性,忽略了多样性,这可能是欧元区危机爆发的原因之一。艾丹·里根认为,欧洲对欧元区财政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的应对举措正导致欧洲国家的民主危机。该危机暴露了多层次政治组织内国家与超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同时使欧洲核心国家与外围国家之间产生了新的政治分裂。这一困境在直接或间接地从“三驾马车”(即欧盟、欧洲中央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接受非市场化经济资助项目的国家中显得尤为严重。由于汇率调节政策缺位,爱尔兰和南欧国家必须实行内部贬值,进而把调整包袱全都推给财政政策和劳动力市场政策。各国政府,无论由何种党派执政,都必须遵守欧洲经济和货币联盟的外部指令,使其福利国家自由化、削减公共开支和实行劳动力市场结构性改革,正是对不同资本主义类型面临的不同经济问题实施“一刀切”的调整方案导致欧元区危机。通过对希腊、爱尔兰、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五国进行比较分析,作者得出结论:此次危机是由欧洲经济和货币联盟在制度和宏观经济方面固有的不对称性造成的,正在欧洲民主国家内引发空前的选举波动以及合法性危机。<sup>②</sup> 阿克·哈瑟尔也对南欧四个遭遇了严重主权债务危机的欧元区国家的制度基础予以关注,并用资本主义多样性文献中的基本观点来说明协调市场经济与混合市场经济在制度设立方面的相互作用。他认为,欧元区的主权债务危机可以解释为以下两个特点的结合:第一,共同货币区的制度框架,它为本地区内存在广泛异质性的经济体设立了共同利率;第二,加入欧元区的两种经济体,即协调市场经济和混合市场经济拥有的具体的制度基础。理解这两个因素及其相互作用不仅有助于解释为何南欧国家更易遭受爆发性公共债务的影响,而且可以解释政策制定者在过去两年欧元区危机持续发展的过程中为何坚持选择紧缩政策而非债务重组。<sup>③</sup> 维维恩·A.施密特从资本主义多样性学派的观点出发,提出并阐释了第三种资本主义类型,即国家影响型市场经济,并以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三国的影响型市场经济体为例,从历时和现时的角度梳理了这三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和政策的演变过程。他认为,尽管一系列政治经济特征是以作为资本主义主要推动力的国家为中心而存在的,但国家影响型市场经济却截然不同。这不仅取决于政治经济环境,也取决于政策、政体和政治。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三国政府通过新自由主义改革削弱了其干预能力,这些改革影响了它们对经济危机做出的应对。<sup>④</sup> 就连西欧各国也是如此,它们于经济高涨时期确立的社会福利制度在经济全球化时期出现危机。福利国家财政不堪重负,经济增长乏力。高福利制度使西欧国家陷入两难困境:欲缓解财政压力,需改革福利制度,但改革遭到民众反对,引发社会对抗和政治危机;要维持社会稳定,需放弃改革,而维持高福利制度又导致国家财政危机。尽管如此,改革福利制度是必然的发展趋向。改革的基本轨迹,将是由“浅”入“深”的渐进过程、改改停停的曲折过程、以“局部调整”为主要形式的漫长过程。<sup>⑤</sup>

拉丁美洲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也具有多样性。墨西哥、智利、巴西和阿根廷这四个拉美国家曾在20世纪70年代初之前经历过相似的发展轨迹,但之后就分道扬镳了。这表明,人们

---

<sup>①</sup>米歇尔·马斯特罗尼、林芳芳(2015):“资本主义多样性的演化:考察制度变革的双层方法”,《国外理论动态》,第11期,第37-53页。

<sup>②</sup>艾丹·里根、陈凤姣(2015):“欧洲资本主义多样性中的政治紧张关系:欧洲民主国家的危机”,《国外理论动态》,第7期,第40-53页。

<sup>③</sup>阿克·哈瑟尔、姬璐、朱洁(2015):“欧元区的调整:资本主义多样性和南欧危机”,《国外理论动态》,第8期,第14-24页。

<sup>④</sup>维维恩·A.施密特、聂咏华(2015):“国家影响型市场经济出了什么问题?——以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应对经济危机的表现为例”,《国外理论动态》,第9期,第31-44页。

<sup>⑤</sup>胡连生(2015):“论西欧福利国家的危机及其未来走向”,《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第4期,第95-100页。

或许可以把以“进口替代”为主导的内向型工业化时期的拉美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讨论,但如今则已无法在这块陆地上找到一种独一无二的发展模式。拉美资本主义与发达国家一样有着多种模式,尽管这些模式尚未定型。<sup>①</sup>也有学者对此并不认同。马蒂亚斯·艾本瑙认为,研究者将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研究方法的应用范围扩大到了拉丁美洲,试图对国家间社会经济不平等的持续存在做出解释,但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未能提供一种令人信服的分析,而这就意味着它无法提供克服这些不平等的政治策略。通过深入剖析资本主义多样性研究方法的理论内核以及新的“层级化市场经济”的理想模型,指明了这种方法在分析方面的三个主要缺陷:从功能主义出发的企业中心主义;方法论上的民族主义;作为基础的非历史主义,并在结论部分提出了另一种考察国家间不平等的视角。<sup>②</sup>

在对资本主义多样性最新文献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凯瑟琳·西伦提出了一个富裕民主国家进行政治经济变革的新思路。大多数传统文献只是按照各个国家的“法团主义”或“协调”(新近的提法)程度的高低来排列它们,而这里所提出的框架则与这些文献所依赖的“连续统模式”大相径庭。这是为了突出现有理论根本未加考虑的那些组合情况:在大规模自由化的同时,高度的平等依然得到了维持;或是在协调程度依然很高的背景下,社会团结程度却出现了下降。文章认为,这些文献长期以来所利用的那些常见的、一分为二的结构变量无法解释这些令人困惑的组合情况,相反,我们必须把注意力更多地转向政治经济制度所依赖的联盟基础。联盟路径表明,过去曾支持较为均等的资本主义多样性的那些制度之所以得以存续,

分析资本主义变革离不开阶级视角。有学者通过研究古典政治经济并不是因为它们顺利复制了“黄金时代”的政治和模式,而是因为它们在全新的政治支持联盟的基础上对形式和功能进行了改造。<sup>③</sup>经济学的核心问题——生产要素之间的剩余分配——验证了资本主义的一个划时代的转变,即从福特主义到金融主导的积累规律。工人工资份额下降是由于资本家阶级在新自由主义范式下成功地实现了跨国阶级统治,而这改变了工会的环境,使其权力资源越来越呈现出无效性。<sup>④</sup>美国和欧洲的工会发展状况实证了这一观点。经过近三十年政治和经济的倒退,尤其2008年全球经济衰退以来,美国劳工运动面临着可能最为严重的危机。美国工会奉行“官僚工联主义”,依赖国家劳工关系委员会,以及由此产生的联盟与亲资本主义民主,使产生于30年代后期的劳资关系法得以执行。在资本主义侵略攻势下,美国劳工机构在谈判中连连让步,以寻求更大的“合作”与管理,并放弃通过常规申诉确保合同执行。<sup>⑤</sup>有人寄希望于在美国内部建立一个更广泛的反资本主义阵营,包括工薪阶层的非洲裔、拉丁裔、亚裔、太平洋岛民和土著居民,也包括街头小贩、日工和性工作者等非正式工人,还包括劳动妇女、年轻人、同性恋、变性人和有组织的白人工人,以及失业工人和被监禁的人,他们是阶级斗争扩大和锐化的基础。<sup>⑥</sup>劳工组织在欧盟层面最重要的跨国工会“欧洲工会联合会”(ETUC)在2008年之后也面临危机。“欧洲工会联合会”大体上是在欧盟“新自由主义妥协”的思想和物质权力结构影响下开展活动的,在思想和行动上对欧盟存在着较大的依赖。工会虽然希望建立一种新的欧洲社会模式,但却并不质疑欧洲的新自由主义一体化方案,

---

<sup>①</sup>伊兰·比兹伯格、赖继、蔡万焕(2015):“拉丁美洲资本主义的几种模式”,《国外理论动态》,第8期,第60-74页。

<sup>②</sup>马蒂亚斯·艾本瑙、郭佩惠(2015):“是资本主义多样性还是依附?——对拉美资本主义多样性研究方法的批判”,《国外理论动态》,第8期,第75-87页。

<sup>③</sup>凯瑟琳·西伦、张志超(2015):“资本主义多样性:自由化的轨迹和社会团结的新政治”,《国外理论动态》,第11期,第19-36页。

<sup>④</sup>Bengtsson, E. & Ryner, M. (2015).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of Falling Wage Shares: Situating Working-Class Agency. *New Political Economy*, 20(3):406 - 430.

<sup>⑤</sup>Moody, K. & Post, C. (2015). The Politics of US Labour: Paralysis and Possibilities. *Socialist Register*, 51(0).

<sup>⑥</sup>Williams, S. & Awatramani, R. (2015). New Working-Class Organization and the Social Movement Left. *Socialist Register*, 51(0).

也不挑战其社会经济基础,因而严重限制了其斗争的成效。<sup>①</sup>也有学者对中国的工会和工人斗争进行分析,认为美国的消费主义和中国的低工资生产共同支撑了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中国政治经济的发展方向将取决于工人斗争的变革作用。中国似乎处在向一个有限的劳动力供应过渡的边缘,这个趋势对于理解中国融入全球经济的不平衡性是非常重要的。<sup>②</sup>

#### 四、金融帝国主义与全球资本主义危机

20世纪后半期,在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发达国家推进的全面金融自由化促成了金融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大卫·科兹认为,目前的经济危机不仅仅是金融恐慌的后果,而是新自由主义,或者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危机导致了这波异常严重的经济衰退。因此,持续的停滞不能通过单独的政策措施来解决,它需要重大的体制改革。目前的紧缩政策是为了加深和维护新自由资本主义,不可能带来一个稳定的经济扩张时期。科兹提出了几种可能的经济结构调整方向,认为重大的经济变化可能2015年底就会到来。<sup>③</sup>

金融资本主义全球化已经深刻地影响到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主权。如何在金融资本与金融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保护本国金融主权,维护国内经济安全,日益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重大课题。围绕美元霸权问题,学术界存在着三种不同的认知,但都存在不足之处。李俊久引入“结构性权力”分析框架,用以揭示美元在世界体系中的结构性霸权。美元霸权的结构属性不仅包括霸权表现的结构属性,更意指霸权来源的结构属性,即美元霸权主要源于美国塑造安全结构、生产结构、贸易结构、金融结构和知识结构的能力。基于这一认识,中国有必要立足于结构性权力的视角,对人民币崛起战略做出更系统和更全面的规划,重点是提升中国在生产、贸易、金融和知识四种权力结构中的地位。<sup>④</sup>李国平、周宏也认为,金融资本与金融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不仅已经影响到现代国际政治经济关系,而且已经从多方面影响到主权国家的金融主权,进而影响到主权国家的金融安全与经济安全。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一方面,需要对金融与经济进行进一步的改革开放,积极参与金融全球化进程,为实现国内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另一方面也要意识到,同发达国家相比,在金融发展水平、金融体系的健全性、金融机构的国际竞争力等方面,中国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金融全球化将可能损害中国的金融主权。<sup>⑤</sup>孙业霞从马克思国际货币职能视角分析并指出,国际货币的四大职能对外汇储备的货币结构和规模大小具有决定性作用。其中,国际价值尺度决定了外汇储备必须是一种国际货币占绝对主导地位的结构,价值尺度二重化是不稳定的货币形式;国际购买手段、国际支付手段以及财富的国际转移手段则决定了一国对外汇储备的需求量,即适度外汇储备规模。我国存在超额外汇储备,而且呈逐年上升的趋势。随着金融危机发生的频率增加和影响范围增大,除需要的外汇储备之外适量持有一部分超额外汇储备资产有一定的必要性,但是超额外汇储备会引发货币发行主控权受到严重冲击、国际净资产大幅贬值和国内通胀等问题。所以,应该减少外汇储备数量,使外汇储备规模回归到适度外汇储备规模。<sup>⑥</sup>

---

<sup>①</sup>王铁军(2015):“后金融危机时代的欧盟工会与欧盟治理——基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视角的考察”,《欧洲研究》,第4期,第82-98页。

<sup>②</sup>Gray, K. & Jang, Y. (2015). Labour Unrest in 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The Case of China's 2010 Strike Wave. *New Political Economy*, 20(4):594 - 613.

<sup>③</sup>David, M. (2015). *Kotz. The Rise and Fall of Neoliberal Capitalis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sup>④</sup>李俊久(2015):“论美元霸权的结构属性及人民币的崛起战略”,《马克思主义研究》,第1期,第62-69页。

<sup>⑤</sup>李国平、周宏(2015):“论金融资本主义全球化与金融主权”,《马克思主义研究》,第5期,第55-62页。

<sup>⑥</sup>孙业霞(2015):“马克思国际货币职能视角下的我国外汇储备适度规模分析”,《马克思主义研究》,第4期,第68-75页。



为了更好地理解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矛盾,我们必须深入分析金融资本和职能资本之间的关系及其变迁过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历史经验表明,利息率与企业利润率的周期性波动关系体现了金融资本和职能资本在资本循环和剩余价值生产中的合作以及剩余价值分配中的权力对抗的关系,而这种关系的演变为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金融化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利息率与非金融部门企业利润率、社会平均利润率之间存在显著的动态相关关系,反映了金融资本与职能资本在资本积累过程中既对立又统一、既对抗又融合的竞争关系。美国在积累过程中经济过度金融化、金融资本权力过大对生产造成掠夺性破坏的事实,对我国是一个重要警示。<sup>①</sup>埃克哈德·海因考察了金融化或金融主导的资本主义影响宏观经济绩效的一个重要渠道,即分配渠道。他收集了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金融主导的资本主义时期15个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在分配方面的经验数据:功能性分配,个人/家庭分配及最高收入人群的比重和组成。根据卡莱茨基的收入分成的确定方法,详细地研究了金融化对功能型收入分配的影响,把一些已确定的金融化事实整合到卡莱茨基方法之中,并通过回顾实证和计量经济学文献发现,自80年代初期以来,金融化和新自由主义通过下述三种主要渠道导致了劳动收入比重的下降:经济部门结构的变化;高管薪资的增加和食利阶层利益要求的增加,以及因此所导致的日常管理费用的增加;工会议价能力的下降。<sup>②</sup>

全球化是资本扩张的内在动力决定的。《罗莎·卢森堡全集》第一卷和第二卷的主题为经济学,包括卢森堡对资本雇佣劳动的全球化、帝国主义和前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一些最重要的论述。除了她的博士论文《波兰的产业发展》有了新译本,第一卷还包括她对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产业化发展的描述,及其对社会各阶层的影响分析。<sup>③</sup>第二卷包含卢森堡关于资本积累的新译本,涉及帝国主义的经济理论和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间的内在联系。这两部作品是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全球化的最重要成果之一。<sup>④</sup>时至今日,全球金融危机和资本主义经济衰退是否标志着资本主义进入金融帝国主义阶段并更加脆弱?很多研究者持肯定观点,但迈克尔·罗伯茨结合美国、欧洲等资本主义国家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认为这场危机并非资本主义新发展的产物,即并非金融资本全球化并占据资本主义经济主导地位的产物,而是一次仍然符合马克思理论的盈利能力危机。马克思的危机理论认为,资本主义危机的最终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尤其是其谋求利润的生产。大衰退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未来全球经济将经历另一次衰退。<sup>⑤</sup>有人认为,通过劳动力向“服务”部门的转移,通过金融和信息技术,后工业化时代的资本主义经济可以无限地“增长”下去。邓肯·弗利从古典主义—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以及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劳动的视角审视这个问题。依据古典地租理论,利息、金融服务费、投机交易利润、知识产权版税等多种资本主义经济收入实际上也是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也来自对生产性劳动的剥削,也是被各方通过不同名义的产权占为己有。得益于网络的外部性,基于网络及其他信息技术的“商业模式”迅猛发展,赚得盆丰钵满,但这些“商业模式”只是体现了剩余价值池的分配方式,并不意味着新的价值生产方式的诞生。国民收入核算习惯于将虚拟产品与其他无法按照市场标准核算的产出归为一类,如专业服务、商业服务、金融、教育、医疗保健行业、政府的产出,这种核算方式误导了大众,扭曲了大众对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价值生产和经济增长问题的认识。只有充

---

<sup>①</sup>赵峰、马慎萧(2015):“金融资本、职能资本与资本主义的金融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美国的现实”,《马克思主义研究》,第2期,第33-41页。

<sup>②</sup>埃克哈德·海因、李艳(2015):“金融主导的资本主义和收入再分配——基于卡莱茨基模式的视角”,《国外理论动态》,第2期,第8-21页。

<sup>③</sup>Luxemburg, R. (2014). *Complete Works of Rosa Luxemburg: Volume 1: Economic Writings 1*, Verso Books.

<sup>④</sup>Luxemburg, R. (2015). *Complete Works of Rosa Luxemburg: Volume 2: Economic Writings 2*, Verso Books.

<sup>⑤</sup>迈克尔·罗伯茨、宋阳旨(2015):“从全球大衰退到长期萧条”,《国外理论动态》,第2期,第31-42页。

分理解“价值通过消耗生产性劳动而产生”和“剩余价值来自对生产性劳动的剥削”等观点，才能正确地看待后工业化时代资本主义的增长、分配、资源保护、环境保护等问题。<sup>①</sup>

随着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西方发达国家的实体经济危机首先转向全球化虚拟金融危机；而后，这种虚拟金融危机又进一步转向空间危机；现在，空间危机经过逐渐深化后则转向制度危机。这充分说明了资本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虽然千方百计通过全球化方式不断在转嫁危机，以期实现资本主义在时间中延伸、在空间中拓展的目标，但是这种延伸和拓展的结果却引发了更复杂、更深刻、更难以治愈的多重危机。多重危机的同时爆发不仅印证了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的科学性和正确性，还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运行模式的根本缺陷。<sup>②</sup>资本的私人属性决定了它的历史局限性，这种局限性决定了资本主义无法找到解决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的根本办法。资本主义体系危机正在持续加剧，在目前阶段又表现出新的态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在第二阶段的特征、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破产、战争可能性的激增以及世界范围人民抵抗运动的高涨。<sup>③</sup>随着人类社会逐渐步入后工业时代，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矛盾主要表现形式的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伴随全球化向世界各国蔓延。如果说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资本家是靠掠夺殖民地的自然资源、压榨附属国的廉价人力资源而致富，今天他们则往往是打着“保护生态”的旗号来推行生态霸权主义。我们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的虚伪性，分析生态危机的本质与根源，理性探讨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开展生态文明建设，真正解决发展中人与自然的矛盾。<sup>④</sup>萨米尔·阿明将法西斯主义在政治舞台上的复辟与当代资本主义的危机联系起来，认为法西斯主义并非某种反对议会制选举民主之不确定性的专制警察政体，而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在特定情况下面临挑战的一种特殊的政治回应。在分析了法西斯主义的两大基本特征和四大表现形式之后，他认为法西斯主义已在西方、东方和南方复辟，而且这种复辟是与普遍化的、金融化的、全球化的垄断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危机的扩散联系在一起的。四面楚歌的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体系与法西斯主义运动的暗中勾结需要引起我们最大的警惕。<sup>⑤</sup>在批判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基础上，德勒克提出后资本主义经济不是别无选择，只能通往一个让我们感到危机四伏的世界，而是有多重选择。从凯恩斯到乔治·索罗斯和约瑟夫·斯蒂格里茨，从托马斯·皮凯蒂和阿玛蒂亚·森，乃至更激进的瑙米·柯雷恩，马克思主义者大卫·哈维，无政府主义者和天文学家托尼·尼格里和米歇尔·哈特，都提出了不同于新自由主义的解决方案。在德勒克看来，生态社会主义替代导致猖獗的气候变化、精英统治和金融混乱的资本主义，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sup>⑥</sup>对于2008年以来全球金融市场的表现和宏观经济的事件，日本政治经济协会提供了一个不同于主流经济学的市场乐观主义的视角。它用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分析当代世界次贷危机，解释了次贷危机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一个特定阶段，并是结构性的，必将摧毁现有的资本积累制度。<sup>⑦</sup>

2015年，学术界持续对《21世纪资本论》进行讨论。与该书刚刚出版时迎来诸多赞美之词不同，各种批判的声音纷至沓来。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出版不久即登

---

<sup>①</sup>邓肯·弗利、车艳秋（2015）：“对金融帝国主义和‘信息’经济的再思考”，《国外理论动态》，第2期，第22-30页。

<sup>②</sup>刘美平（2015）：“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三次转向”，《马克思主义研究》，第3期，第91-97页。

<sup>③</sup>杨艳（2015）：“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危机的持续加剧”，《马克思主义研究》，第3期，第98-106页。

<sup>④</sup>周光迅、王敬雅（2015）：“资本主义制度才是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马克思主义研究》，第8期，第135-143页。

<sup>⑤</sup>萨米尔·阿明、宾建成（2015）：“法西斯主义在当代资本主义的复辟”，《国外理论动态》，第5期，第23-29页。

<sup>⑥</sup> Wall, D. (2015). *Economics After Capitalism: A Guide To The Ruins And A Road To The Future*, Pluto Press.

<sup>⑦</sup> Yagi, K., Yokokawa, N., Shinjiro, H. & Dymiski, G. (2015). *Crises of Global Economies and the Future of Capitalism*, Routledge.

上最畅销书排行榜。评论家们一致认为，这本书是很重要的，因为它涉及美国经济、英国经济和许多发达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它还提供了一个解释问题的视角和一个政策解决方案：全球性的财富税。史蒂芬·普列斯曼认为，日益加剧的不平等不仅仅是资本主义的特性，不同的增长率、收入和财富可以发生在任何类型的经济系统。<sup>①</sup>美国学者满奎指出，皮凯蒂揭示的  $r > g$  是“资本主义的矛盾”，这将导致一个“无尽的不平等的螺旋”，同时他的资本全球新税制也不可行。<sup>②</sup>在中国，《21 世纪资本论》引起部分认同，但总体来说遭到了更为猛烈的批判。丁为民把集中反映皮凯蒂研究成果的若干曲线称为皮凯蒂曲线，说明了该曲线和相关理论对揭露资本主义条件下两极分化的趋势、原因和后果的意义；批评了皮凯蒂理论和政策建议的缺陷，分析了其形成原因；利用现代成果为马克思的利润率趋向下降理论进行了辩护。<sup>③</sup>把《21 世纪资本论》视为《资本论》续篇的观点是错误的，它忽视了两者在理论立场、研究取向、中心问题和核心范畴等方面的原则性区别，混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界限。高估《21 世纪资本论》应对不平等方案的观点是偏颇的，忽视所有制的决定性作用，迷信用税收和福利国家模式解决分配不公，是舍本求末。不过，应该肯定《21 世纪资本论》对于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有一定的参考价值。<sup>④</sup>当前处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危机阶段，资本主义进入大转折时期，社会对不平等问题的持续地高度关注，社会民主主义也跟随民意，开始高度重视不平等问题。《21 世纪资本论》很好地回应了这些趋势，而全球社会和社会民主主义也很好利用了该书提供的论证推进本来很热的对不平等问题讨论，所以该书产生了很大影响，但是该书提出的解决不平等问题方案不足以应对当前时代的危机，所以它的影响将逐渐衰落，而新的类似的理论探索著作将继续涌现。<sup>⑤</sup>

## 五、中特理论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中国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最鲜明的特色，是“中国道路”的基本内涵。它不仅使马克思主义焕发了新的生机和活力，而且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形态；不仅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得以延续和发展，而且创造和丰富了实现现代化的新模式；不仅促进了世界的历史性进步和经济全球化，使历史成为真正的“世界历史”，而且使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力量更加坚定；不仅成功创造了一种新的社会制度文明，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日趋完善，而且将使人类文明发展前景更加广阔。<sup>⑥</sup>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从中国具体国情出发的，其道路、理论体系和社会制度不能照搬到其他国家。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同时也是最有普遍性的经验，是超出一国范围的具有普遍真理性的思想原则。它本身就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和世界社会主义的重要贡献。中国的实践为历史发展总趋势提供了有力证明，也为前进中的社会主义不断提出新的课题。<sup>⑦</sup>

发展中大国经济形态的演进，大体上会经历以下阶段：在发展之初，更多地通过与世界尤其是世界强权的隔离，甚至是封闭自己来保护自我；在实力强大后，会逐渐开放本国经济，甚至推行开放经济形态。新中国成立 60 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形态经历了内向型经济、封闭型经济和外向型经济等几种类型的演变。从经济发展与经济形态的关系来看，自由、公平的

<sup>①</sup>Pressman, S. (2015). *Understanding Piketty's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Routledge.

<sup>②</sup>Mankiw, N. G. (2015). Yes,  $r > g$ . So Wha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5(5):43 - 47.

<sup>③</sup>丁为民 (2015): “皮凯蒂曲线：两极分化、资本趋势与解决方案”，《马克思主义研究》，第 3 期，第 79-90 页。

<sup>④</sup>杨军 (2015): “关于《21 世纪资本论》若干评论的辨析”，《马克思主义研究》，第 9 期，第 73-78 页。

<sup>⑤</sup>刘元琪 (2015): “资本主义大转折时期与《21 世纪资本论》”，《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第 2 期，第 93-100 页。

<sup>⑥</sup>田鹏颖 (2015): “论中国改革开放的世界历史意义”，《马克思主义研究》，第 5 期，第 47-54 页。

<sup>⑦</sup>田心铭 (2015): “中国与世界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研究》，第 3 期，第 5-11 页。

开放型经济应该是一国发展追求的更高目标。中国应该采取“近期大力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远期积极推进自由、公平贸易”的两步走战略，发展开放型经济。操之过急，有可能会欲速则不达；而缩手缩脚，更有可能会错失发展良机。<sup>①</sup>总结开放 38 年的历史经验，可以划分为两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1976 年 10 月打倒“四人帮”至 2000 年加入 WTO，特点是局部突破，以开放促改革。2000 年加入 WTO 为标志，对外开放进入第二阶段。现在，中国需要进一步增强改革开放的自信心，树立世界大国地位。<sup>②</sup>

李扬、张晓晶基于长周期视角，对全球范围内旧、新常态及其更替逻辑进行鸟瞰式研究，讨论了结构性减速新常态下中国经济面临的新矛盾与新挑战，指出新常态所展示的摆脱中等收入陷阱、迈上经济发展新台阶的美好愿景亟须正确的引领，这包括打造创新驱动引擎、在调结构中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构筑全面对外开放新格局、向生态环境改善中求增长以及实现包容性增长。<sup>③</sup>以贸易投资的数量增长作为“开放红利”的主要标准是过去高速增长阶段以规模速度、扩能增量为特征的发展方式在对外开放领域的折射。在新一轮的对外开放中，如果我们继续沿袭以往对开放型经济发展的评价思路，即主要以贸易投资增长的幅度和规模作为评价的主要依据，从未来若干年世界分工和贸易投资发展的趋势来看，可能并不能得到满意的结果，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开放型经济的发展不成功。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对外开放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新思路，为如何评价新一轮对外开放的绩效提供了基本依据。目前国家着力实施的对外开放战略蕴含了对外开放的新的价值取向，有必要对未来，包括“十三五”期间开放型经济的发展指标做出新的研究。<sup>④</sup>采集 22 个中国主要贸易伙伴 1984—2012 年的数据，利用 System GMM 方法剖析“中国制造”对全球经济“大稳健”时期的影响，研究发现：贸易规模、实际有效汇率、石油价格、固定资产投资等变量显著扩大了全球经济波动，但是“中国制造”显著抑制了各国产出增长率波动，显著降低了发达国家物价水平的波动，有助于全球经济增长维系在“高水平、低波动”区制。全球价值链下的“中国制造”是一个长期变量。中国应利用全球价值链重组，进一步提升和发展加工制造业，拓展国际市场空间；面对发达国家不合理的贸易制裁，有选择地使用“镜像策略”，选取对方同一行业或者相似企业进行相应的反制裁；加强与其他国家的政策协调，改善全球经济治理，构建全球价值链时代的国际经济新秩序。<sup>⑤</sup>

当代西方跨国公司由大型跨国生产性企业、跨国金融机构和金融服务企业等组成，它是资本开拓全球市场的产物和载体，也是经济全球化下西方发达国家维护金融霸权的重要工具。这些巨型公司对他国的国家经济主权产生了巨大冲击。由于种种原因，我国三大产业中的许多行业被当代西方跨国公司及其代表的金融资本所渗透和控制，国家经济主权受到较大影响。在全面深化改革与扩大对外开放过程中，我们应采取切实有效措施维护国家经济主权，积极应对全球范围内新殖民主义扩张所带来的负面影响。<sup>⑥</sup>随着分割式生产兴起，垂直型的要素分工逐渐成为主流，明显拓展了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分工网络的深度和广度。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承接离岸外包所直接耗费的生产性劳动及背后的广义复杂劳动，并未得到足够的价值补偿，而且其整体劳动生产率的动态提升也会受到抑制。因而，中国在参与全球生产网络时，应

---

<sup>①</sup>宋泓（2015）：“中国是否到了全面推进开放型经济的新阶段？”，《国际经济评论》，第 4 期，第 9-25 页。

<sup>②</sup>杨帆（2015）：“中国对外开放的历史与展望”，《管理世界》，第 4 期，第 172-173 页。

<sup>③</sup>李扬、张晓晶（2015）：“‘新常态’：经济发展的逻辑与前景”，《经济研究》，第 5 期，第 4-19 页。

<sup>④</sup>裴长洪（2015）：“经济新常态下中国扩大开放的绩效评价”，《经济研究》，第 4 期，第 4-20 页。

<sup>⑤</sup>杨继军、范从来（2015）：“‘中国制造’对全球经济‘大稳健’的影响——基于价值链的实证检验”，《中国社会科学》，第 10 期，第 92-113、205-206 页。

<sup>⑥</sup>王健、谢长安（2015）：“论当代西方跨国公司对我国经济主权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研究》，第 11 期，第 59-67 页。

当抓住“一带一路”建设提供的对外产能合作机遇,实现各部门的有序开放和协同升级。<sup>①</sup>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立意高远,构思恢弘,运作睿智,其中贯彻着一系列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经济理念创新。在经济活动起点、经济机制、运作方式、运作规则和运作结果等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西方国际经济学都存在明显的理念差异。60多年来,中国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习近平提出的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等新理念都贯彻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理念。从中国角度看,“一带一路”的发展战略构想实现了三大突破。要落实这一战略构想,应重视五个方面举措的付之于行。<sup>②</sup>有学者认为小多边主义是中国对外经济政策的一个特点,而中小多边主义就是指多边机构无法在其成员国间达成一致时,在小的国家聚集组内或多边机构以外解决问题。它在近年的经济外交中有着显著地位,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等都是很好的例子。金融小多边主义不是全新的,它包括各种次全球金融合作计划,如七国集团和二十国集团(G20)。它在中国对外经济政策中也并非新产物,但过去一年中国参与金融小多边主义的速度在加快。一些人欢迎这种策略,但其他人则认为它破坏了现有的国际金融秩序。中国政府的目的是刺激全球多边主义机构改革,为成员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公共物品,同时直接提高中国的经济政治地位。中国领导层并不寻求推翻现有的多边框架,但如果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总是被迫到现有多边体系外去满足需求,那它们的行动可能会削弱全球金融治理的多边机构。<sup>③</sup>

中国的发展成就引发了西方学者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反思性研究。西方学者认为,毛泽东在政治领导核心、平稳转轨进程和经济增长要素三方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差异体现在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共产党的政治领导、集体主义的价值取向和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等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真正超越资本主义,需要在社会公正、政府廉洁、可持续发展和新农村建设方面做出更多的努力。<sup>④</sup>对于西方学者的观点,我们要加以辩证的分析。中国道路的世界历史意义在于,它比较成功地破解了后发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所遇到的一系列历史性难题。西方学者认为只有走资本主义道路才能实现现代化,后发国家沿着社会主义道路能不能实现现代化?资本主义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的后发国家率先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吸收和利用资本主义的先进文明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社会主义文明?社会主义国家怎样才能形成防止向资本主义演变的内在机制,确保社会主义的可持续发展?中国道路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对这些重大问题做出了初步回答,并继续进行着更深入的探讨。<sup>⑤</sup>

## 六、世界社会主义与国际共运理论

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在战役层面取得了一些成功:在理论上各国共产党深刻揭示了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性质、根源等一系列理论问题;在实践中它们积极投身到反对垄断资本转嫁经济危机的斗争中,工人运动有新的觉醒;在党的建设上也取得了新的进展。然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仍然处于低潮,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在政治生活中被“边缘化”的处境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要破解战略发展的困局,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必须从解决自身存在的诸多问题做起。<sup>⑥</sup>虽然人类走向社会主义是一种不可抗拒的运动,但这并非意味着

---

<sup>①</sup>张雨微、赵景峰、刘航(2015):“生产分割下的国际价值转移及对中国新型开放战略的启示”,《马克思主义研究》,第11期,第68-74页。

<sup>②</sup>王国刚(2015):“‘一带一路’: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经济理念创新”,《国际金融研究》,第7期,第3-10页。

<sup>③</sup>王红英、杨国梁(2015):“从韬光养晦到有所作为——中国的金融小多边主义”,《国际经济评论》,第2期,第150-152页。

<sup>④</sup>于国辉(2015)“近年来西方学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反思性研究及其评析”,《马克思主义研究》,第9期,第139-146页。

<sup>⑤</sup>陈明凡(2015):“中国道路对当代社会主义历史性难题的破解”,《马克思主义研究》,第9期,第126-132页。

<sup>⑥</sup>聂运麟(2015):“战役成功与战略困局: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态势”,

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一切客观条件均已成熟,而且客观条件形成的仅仅是社会重建的物质基础,而它未来的发展取决于作为社会经济主体的国家的活力,没有准备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只是主观的或人为的因素。医治反社会主义、反共产主义情绪的最好“良药”,是认真研究世界各国的社会主义思想,以及社会主义各国包括苏联在内的社会主义实践。<sup>①</sup>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的一种富有生机和活力的新型社会主义理论、发展道路和模式。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和实践特征是其“特色”的集中体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蕴含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是对中国和世界社会主义发展进程的准确判断,不仅推动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迅速发展,而且极大地促进了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从而使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实现了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发展的新篇章。<sup>②</sup>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在全球范围内受到广泛关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取得的一系列成就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释放了强大的“正能量”,在经济、政治与文化等主要领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为拉美国家提供了良好的示范效应。<sup>③</sup>反过来,我们再看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厄瓜多尔等国各具特色的“21 世纪社会主义”模式何以可能?拉美“21 世纪社会主义”是杂糅了地区历史和现实多重元素的新政治运动,是变化发展中的新社会主义流派,是更加强调本土特色、替代色彩和地区合作的社会主义。拉美“21 世纪社会主义”的出现既有历史必然性,也含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被称为未曾革命的“革命”。未来,拉美“21 世纪社会主义”仍有待突破和超越外围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经济结构和制度形态。<sup>④</sup>

通过论述 21 世纪三种不同的社会主义模式,即自由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和市场社会主义,我们可以发现这三种模式的共同核心原则皆在于平等原则和社群原则。对这两个原则的分析将为我们减少全球社会不公提供契机。新时期社会主义最美好的愿景实质上就在于克服社会主义分配不均、排他性和剥夺行动权三大非正义向度。<sup>⑤</sup>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兴起就是一个例子。穷人们抗议极端的经济不平等,抗议政府的政策和企业控制的经济生活,使他们陷入贫困状态。华尔街运动的特征是无政府主义,即没有正式的领导(horizontalism),没有明确预期(试图在运动中实践自己所期望的未来社会模式),只是表达了自治、互助和对政府权威的蔑视。虽然“占领华尔街”有意避开了传统政治活动的形式,但是它通过影响新闻话语权,为政治改革开辟了空间。<sup>⑥</sup>不过,总体来说,美国工人阶级的力量十分薄弱。很难想象左翼能够挑战公司权力和资本主义霸权,因为那种力量离开选区尚不存在,它必须被创建。现实是:一方面,危机后资本主义的进攻十分猖獗;另一方面,工人阶级没有能力迎接挑战。<sup>⑦</sup>

过去 20 年,有关全球化和国家的辩论在进步的自由人士和左翼民族主义者中一直占主导地位。进步的自由主义者,包括社会民主党人和一些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不仅经济,而且

---

《马克思主义研究》,第 10 期,第 135-141 页。

<sup>①</sup>IO.琼科夫、杨伟民(2015):“人类走向社会主义是一种不可抗拒的运动”,《马克思主义研究》,第 9 期,第 119-125 页。

<sup>②</sup>李庆云(2015):“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色’与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第 3 期,第 126-129 页。

<sup>③</sup>金瑶梅(2015):“浅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拉美国家的示范效应”,《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第 4 期,第 191-196 页。

<sup>④</sup>贺钦(2015):“试析拉美‘21 世纪社会主义’的历史源流及其本质”,《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第 3 期,第 76-82 页。

<sup>⑤</sup>维多里奥·布法切、洪燕妮(2015):“21 世纪的社会主义模式:自由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和市场社会主义”,《国外理论动态》,第 1 期,第 75-82 页。

<sup>⑥</sup>Lederman, S. (2015). The Anarchism of Occupy Wall Street. *Science & Society*, 79(2):243 - 263.

<sup>⑦</sup>Dudzic, M. & Reed, A. (2015). The Crisis of Labour and the Left in the United States. *Socialist Register*, 51(0).

政治进程已经全球化。相比之下，左翼的民族主义者把经济和政治过程类意识形态化。两个阵营的问题是，假设资本积累的空间和国家行动的空间之间具有兼容性，这使得它不可能解释国际积累的矛盾，并开发出基于阶级的政治替代品。即使经济进程是国际化的，政府仍然主要是管理一个国家的事务。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国家在特定的社会形态下没有落入到任何抽象的国际主义和民族主义的陷阱。<sup>①</sup>

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澄清了某些理论问题，并指出发展道路。邓小平有关新时期发展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战略思想，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经验的总结，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他的主要贡献是：倡导新时期的国际主义，反对“国际共运中心论”；制定“向前看”的总方针，妥善解决国际共运史上的遗留问题；确立新型政党关系的准则，反对父子党关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积极面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变革与转型；冷静应对运动的低潮时期，对社会主义的未来充满信心。<sup>②</sup>同时，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值得社会主义国家关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来，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生态社会主义思潮与运动获得了新发展，其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生态社会主义作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一支非常有潜力的发展力量，提出了许多颇具价值的思想观点和理论主张，值得我们认真对待。<sup>③</sup>

## 七、总结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了全球性的金融-经济危机，生态危机又加剧了这一危机。资本主义世界可能出现“内爆”（萨米尔·阿明语），挽救资本主义的危亡成为国外理论界普遍关心的话题。左翼学者纷纷指出，资本主义多重危机没有偏离马克思所预言的结果，其原因仍然是资本主义固有矛盾造成的，重建社会主义是唯一出路。也有一些学者指出，社会主义国家，乃至新兴国家的群体崛起任重道远，资本主义仍有生机与活力，注重多样性就是克服危机的一个解决方案。

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阶级分析的视角不可或缺。虽然社会变革的根本动因在于内部的经济基础，但有组织工人对变革的推动作用不能低估。遗憾的是，目前资本主义世界虽然飘摇，但大金融资本家和工业寡头未受实质打击，劳工力量在壮大，却没有形成实质性的挑战资本的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自己在经济领域的成功增强了说服力和吸引力，也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指明了方向，但并非没有丝毫问题。与生态帝国主义相对立，生态社会主义的观点应引起我们的重视。

改革开放的30年，中国受益于全球化，也因此成为全球化的坚定支持者。新常态下中国经济面临新的矛盾与挑战，必须打造创新驱动引擎，构筑全面对外开放新格局，同时也要加强风险防范意识。金融资本与金融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不仅已经影响到现代国际政治经济关系，而且已经从多方面影响到主权国家的金融主权，进而影响到主权国家的金融安全与经济安全。从某种角度上讲，超额外汇储备对中国可能是双刃剑。全球价值链下的“中国制造”是一个长期变量。中国应利用全球价值链重组，进一步提升和发展加工制造业，拓展国际市场空间；面对发达国家不合理的贸易制裁，有选择地进行反制裁；加强与其他国家的政策协调，改善全球经济治理，构建全球价值链时代的国际经济新秩序。

中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位置不可低估。然而，在世界体系中，中美关系仍然表现为“中心一边缘”特征。“一带一路”是党中央在新时期提出的伟大构想，是打破战略封锁、主动对外合作的新举措，是中华民族政治智慧的外化，应上升到战略层面来认识其意义。

---

<sup>①</sup>Huato, J. (2015). Rethinking Globalization as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apital: Implications for Understanding State Restructuring. *Science & Society*, 79(2):318 - 325.

<sup>②</sup>聂运麟（2015）：“邓小平发展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几个重要战略思想”，《马克思主义研究》，第4期，第116-125页。

<sup>③</sup>张剑（2015）：“生态社会主义的新发展及其启示”，《马克思主义研究》，第4期，第126-134页。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政治经济的基本原理和逻辑推导,致力于分析现实世界,并提出改造世界的方案,关心劳动人民和边缘群体的疾苦与斗争意向,富有科学性和战斗性。在研究中,我们要谨防把马克思主义扩大化,把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成果也当作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也要谨防把马克思主义缩小化,削弱其对现实世界的话语权。总之,应辩证地、历史地看待现阶段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对西方左翼学者的观点和方法尤其要加以分析,才能去粗取精、去伪存真。

### 英文参考文献

1. Bengtsson, E. & Ryner, M. (2015).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of Falling Wage Shares: Situating Working-Class Agency. *New Political Economy*, 20(3):406–430.
2. David, M. (2015). *Kotz. The Rise and Fall of Neoliberal Capitalis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3. Dudzic, M. & Reed, A. (2015). The Crisis of Labour and the Left in the United States. *Socialist Register*, 51(0).
4. Gray, K. & Jang, Y. (2015). Labour Unrest in 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The Case of China's 2010 Strike Wave. *New Political Economy*, 20(4):594–613.
5. Huato, J. (2015). Rethinking Globalization as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apital: Implications for Understanding State Restructuring. *Science & Society*, 79(2):318–325.
6. Lederman, S. (2015). The Anarchism of Occupy Wall Street. *Science & Society*, 79(2):243–263.
7. Luxemburg, R. (2015). *Complete Works of Rosa Luxemburg: Volume 2: Economic Writings 2*, Verso Books.
8. Luxemburg, R. (2014). *Complete Works of Rosa Luxemburg: Volume I: Economic Writings 1*, Verso Books.
9. Mankiw, N. G. (2015). Yes,  $r > g$ . So Wha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5(5):43–47.
10. Moody, K. & Post, C. (2015). The Politics of US Labour: Paralysis and Possibilities. *Socialist Register*, 51(0).
11. Pressman, S. (2015). *Understanding Piketty's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Routledge.
12. Wall, D. (2015). *Economics After Capitalism: A Guide To The Ruins And A Road To The Future*, Pluto Press.
13. Williams, S. & Awatramani, R. (2015). New Working-Class Organization and the Social Movement Left. *Socialist Register*, 51(0).
14. Yagi, K., Yokokawa, N., Shinjiro, H. & Dymski, G. (2015). *Crises of Global Economies and the Future of Capitalism*, Routledge.

### 中文参考文献

1. Ю.琼科夫、杨伟民(2015):“人类走向社会主义是一种不可抗拒的运动”,《马克思主义研究》,第9期,第119-125页。
2. 丁为民(2015):“皮凯蒂曲线:两极分化、资本趋势与解决方案”,《马克思主义研究》,第3期,第79-90页。
3. 于国辉(2015):“近年来西方学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反思性研究及其评析”,《马克思主义研究》,第9期,第139-146页。



4. 马蒂亚斯·艾本瑙、郭佩惠（2015）：“是资本主义多样性还是依附？——对拉美资本主义多样性研究方法的批判”，《国外理论动态》，第8期，第75-87页。
5. 王红英、杨国梁（2015）：“从韬光养晦到有所作为——中国的金融小多边主义”，《国际经济评论》，第2期，第150-152页。
6. 王国刚（2015）：“‘一带一路’：基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国际经济理念创新”，《国际金融研究》，第7期，第3-10页。
7. 王铁军（2015）：“后金融危机时代的欧盟工会与欧盟治理——基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视角的考察”，《欧洲研究》，第4期，第82-98页。
8. 王健、谢长安（2015）：“论当代西方跨国公司对我国经济主权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研究》，第11期，第59-67页。
9. 邓肯·弗利、车艳秋（2015）：“对金融帝国主义和‘信息’经济的再思考”，《国外理论动态》，第2期，第22-30页。
10. 艾丹·里根、陈凤姣（2015）：“欧洲资本主义多样性中的政治紧张关系：欧洲民主国家的危机”，《国外理论动态》，第7期，第40-53页。
11. 田心铭（2015）：“中国与世界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研究》，第3期，第5-11页。
12. 田鹏颖（2015）：“论中国改革开放的世界历史意义”，《马克思主义研究》，第5期，第47-54页。
13. 尼克斯·斯特拉夫拉克斯、盛国荣（2015）：“希法亭与马克思”，《国外理论动态》，第3期，第65-81页。
14. 迈克尔·罗伯茨、宋阳旨（2015）：“从全球大衰退到长期萧条”，《国外理论动态》，第2期，第31-42页。
15. 伊兰·比兹伯格、赖继、蔡万焕（2015）：“拉丁美洲资本主义的几种模式”，《国外理论动态》，第8期，第60-74页。
16. 刘元琪（2015）：“资本主义大转折时期与《21世纪资本论》”，《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第2期，第93-100页。
17. 刘宇（2015）：“论全球化时代的阶级斗争问题”，《马克思主义研究》，第11期，第110-117页。
18. 刘美平（2015）：“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三次转向”，《马克思主义研究》，第3期，第91-97页。
19. 米歇尔·马斯特罗尼、林芳芳（2015）：“资本主义多样性的演化：考察制度变革的双层方法”，《国外理论动态》，第11期，第37-53页。
20. 阿克·哈瑟尔、姬璐、朱洁（2015）：“欧元区的调整：资本主义多样性和南欧危机”，《国外理论动态》，第8期，第14-24页。
21. 孙业霞（2015）：“马克思国际货币职能视角下的我国外汇储备适度规模分析”，《马克思主义研究》，第4期，第68-75页。
22. 李扬、张晓晶（2015）：“‘新常态’：经济发展的逻辑与前景”，《经济研究》，第5期，第4-19页。
23. 李庆云（2015）：“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色’与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第3期，第126-129页。
24. 李国平、周宏（2015）：“论金融资本主义全球化与金融主权”，《马克思主义研究》，第5期，第55-62页。
25. 李俊久（2015）：“论美元霸权的结构属性及人民币的崛起战略”，《马克思主义研究》，第1期，第62-69页。

26. 李滨(2015):“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逻辑”,《世界经济与政治》,第7期,第4-23页。
27. 杨帆(2015):“中国对外开放的历史与展望”,《管理世界》,第4期,第172-173页。
28. 杨军(2015):“关于《21世纪资本论》若干评论的辨析”,《马克思主义研究》,第9期,第73-78页。
29. 杨艳(2015):“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危机的持续加剧”,《马克思主义研究》,第3期,第98-106页。
30. 杨继军、范从来(2015):“‘中国制造’对全球经济‘大稳健’的影响——基于价值链的实证检验”,《中国社会科学》,第10期,第92-113、205-206页。
31. 沈斐(2015):“资本内在否定性框架中的跨国资本和全球治理”,《马克思主义研究》,第11期,第75-83页。
32. 宋泓(2015):“中国是否到了全面推进开放型经济的新阶段?”,《国际经济评论》,第4期,第9-25页。
33. 张雨微、赵景峰、刘航(2015):“生产分割下的国际价值转移及对中国新型开放战略的启示”,《马克思主义研究》,第11期,第68-74页。
34. 张剑(2015):“生态社会主义的新发展及其启示”,《马克思主义研究》,第4期,第126-134页。
35. 陈明凡(2015):“中国道路对当代社会主义历史性难题的破解”,《马克思主义研究》,第9期,第126-132页。
36. 欧阳向英、刘国平、李燕(2015)《马克思主义世界政治经济基础理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年版。
37. 凯瑟琳·西伦、张志超(2015):“资本主义多样性:自由化的轨迹和社会团结的新政治”,《国外理论动态》,第11期,第19-36页。
38. 金瑶梅(2015):“浅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拉美国家的示范效应”,《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第4期,第191-196页。
39. 周光迅、王敬雅(2015):“资本主义制度才是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马克思主义研究》,第8期,第135-143页。
40. 周淼(2015):“生产、垄断、帝国主义的变迁与当今时代”,《马克思主义研究》,第8期,第81-89页。
41. 赵峰、马慎萧(2015):“金融资本、职能资本与资本主义的金融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美国的现实”,《马克思主义研究》,第2期,第33-41页。
42. 胡连生(2015):“论西欧福利国家的危机及其未来走向”,《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第4期,第95-100页。
43. 贺钦(2015):“试析拉美‘21世纪社会主义’的历史源流及其本质”,《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第3期,第76-82页。
44. 埃玉普·欧兹维伦、乌特库·哈乌斯、艾穆拉赫·卡劳祖兹、尹昕、曹浩瀚(2015):“从资本主义阶段到资本主义多样性:教训、局限和前景”,《国外理论动态》,第11期,第2-18页。
45. 埃克哈德·海因、李艳(2015):“金融主导的资本主义和收入再分配——基于卡莱茨基模式的视角”,《国外理论动态》,第2期,第8-21页。
46. 聂运麟(2015):“邓小平发展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几个重要战略思想”,《马克思主义研究》,第4期,第116-125页。
47. 聂运麟(2015):“战役成功与战略困局: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世界社会主

义运动发展态势”，《马克思主义研究》，第10期，第135-141页。

48. 萨米尔·阿明、宾建成（2015）：“法西斯主义在当代资本主义的复辟”，《国外理论动态》，第5期，第23-29页。

49. 维多里奥·布法切、洪燕妮（2015）：“21世纪的社会主义模式：自由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和市场社会主义”，《国外理论动态》，第1期，第75-82页。

50. 维维恩·A.施密特、聂咏华（2015）：“国家影响型市场经济出了什么问题？——以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应对经济危机的表现为例”，《国外理论动态》，第9期，第31-44页。

51. 渡边雅男、谭晓军（2015）：“在历史发展和现实运动中把握全球化的本质”，《马克思主义研究》，第11期，第101-109页。

52. 裴长洪（2015）：“经济新常态下中国扩大开放的绩效评价”，《经济研究》，第4期，第4-20页。

（编辑：孙丽丽）